

关于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記 的考察和研究

鞠德源

明朝政府在我国黑龙江下游，元代东征元帅府的故地，今称特林地方，设置奴儿干都司，并建造永宁寺一处，立碑两座：一为《敕修奴儿干永宁寺记》，立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九月；一为《重建永宁寺记》，立于宣德八年（1433年）春季。两篇碑记简要地记叙了世世代代居住在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地区的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生产和生活的状况，以及明朝政府对当地居民的关怀，明确记载着钦差内官亦失哈等高级官员历次前往奴儿干地区及海东苦夷（库页岛）上巡视和慰问女直、吉列迷、“诸种野人”、“苦夷诸民”的经过；阐明了明朝政府在奴儿干地区造寺塑佛的宗教和政治的目的，推行“柔化斯民”政策所取得的成效；描绘了各族人民效忠明朝政府，履行属民义务，表示“世世臣服”的热烈场面。在两篇碑记的题名部分，详细记载着前往奴儿干地区进行巡视慰问活动和造寺塑佛的钦差内官、东北各地主

要卫所官员和奴儿干都司衙门官员的官职、姓名，特别列署了安乐、自在二州各族官员的名字和各族工匠、医生等人的名字。总而言之，两篇碑记所载的史实，有力地说明：（一）经营和管辖奴儿干地区是明朝政府的既定国策，并且完全符合当地各族人民内属统一的意愿；（二）经营东北边疆的活动是由明朝政府统一组织的，并有东北地方都司、卫所各级官员、各族首领、各族劳动人民参加的联合行动。^①


永宁寺虽久已堙圮，但它的两座刻碑却巍峨雄峙，高耸于黑龙江下游特林地方的悬崖之上，历经近五个世纪的风涛雪雨，时刻以它本身的历史和文字记录证明着一个铁的历史事实：黑龙江流域，包括奴儿干海东库页岛在内，在历史上是中国政府的传统管辖疆域；这一地域的世居各族人民是明朝政府的属民，明朝政府在这一地域行使国家主权是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和理所当然的继承。

明朝政府在奴儿干特林地方的历史遗迹——永宁寺及其碑记，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沦落异域，倍受摧残。然而，关于它们的历史，不仅早已载入中国的图籍和史册，而且受到了中外人士的多方考察和研究，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记录和著述。

一、清代前期关于奴儿干永宁寺碑记的图籍文献

关于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的碑刻，论者皆以为清朝政府无正式的文字记录，其实不然，在清廷收藏的舆图、官修志书和私家著述里，早有明确而简要的记载。

^①《敕修奴儿干永宁寺记》、《重建永宁寺记》，参见钟民岩等《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校释》，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清康熙朝绘制的满文《胡尔哈河入海图》，是清朝政府关于奴儿干永宁寺两座明碑的最早纪录，是目前新发现的最有权威性的历史凭证。此图系用高丽纸墨绘而成，刳接一卷，后被修裱者分裱成二十小幅，并误题为《黑龙江流域图》；图幅高35公分，每幅长短不等，合计总长21.92公尺。此图从胡尔哈河（今称牡丹江）中游及布尔哈土城、尼堪城画起，一直画到混同江口（即黑龙江口）和东海。凡胡尔哈河、松花江、混同江两岸的山峦、石礮、江心岛屿、水草树木、大小支流，均采用形象画法；江心岛屿的大小，均照实在位置画出；水草树木，稀疏茂密，因岛而异，树木有阔叶、灌木、杉树，皆画得生动逼真。凡属城廓，均用表示，河流、村屯、山脉等名称，一律用满文标写；有关民族居住活动地域界线，附有文字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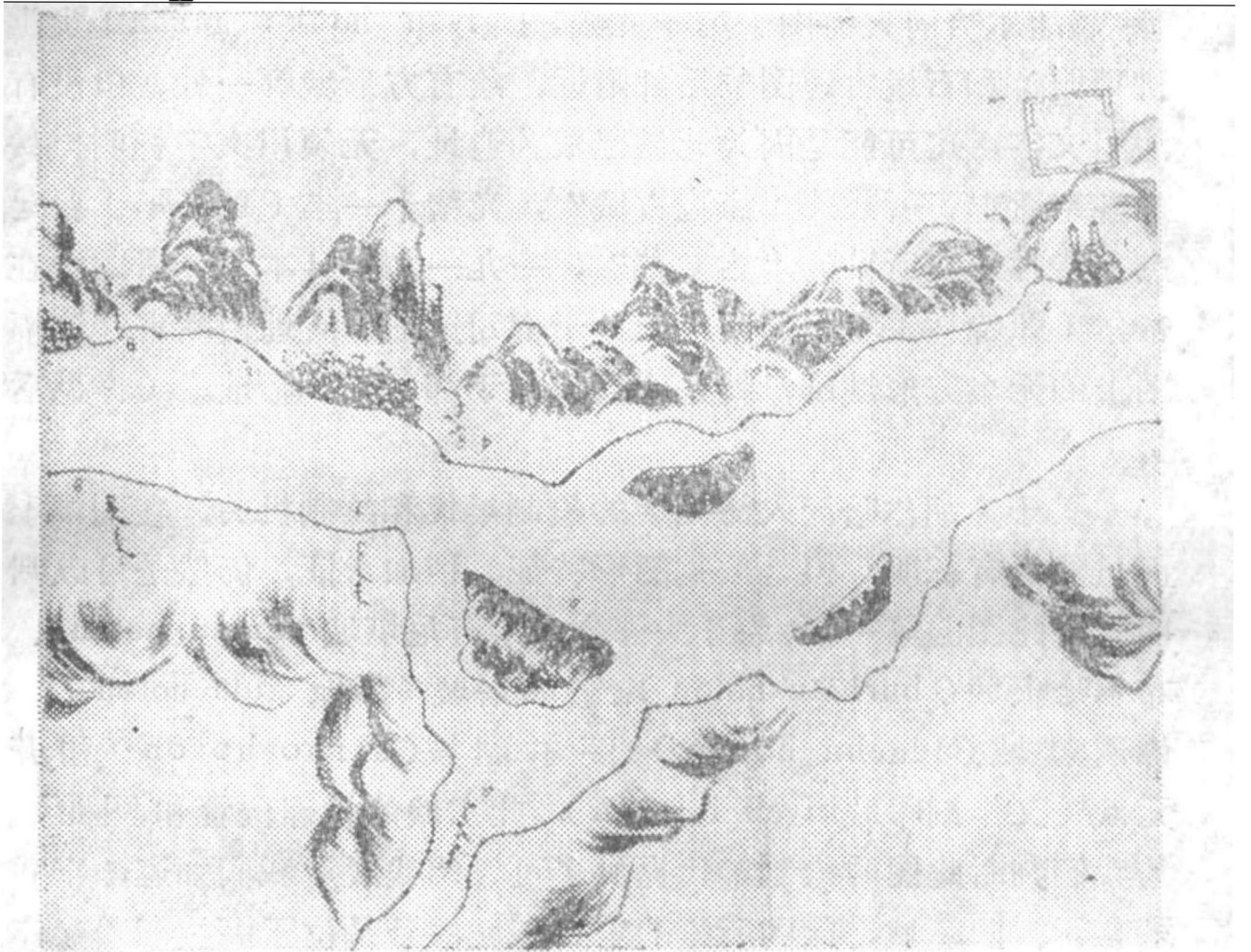
就在这份《胡尔哈河入海图》的第十九幅里，于亨滚河（今苏称阿姆贡河）口的斜对岸（即右岸）处，绘有石礮一处，崖上清清楚楚绘有两座石碑的图象。并在石礮的后面附近绘有方形城廓一处，在靠近江岸的地方注写满文 *giyah nongko gasan*（尖洪科噶珊）^①，汉意为山梁尽头处的屯子。在此噶珊（汉意为屯子）同一侧的下方，还注写满文 *kuhun gasan*（库浑噶珊），*takcin gasan*（塔克提音噶珊），上方写有满文 *muholen gasan*（莫胡伦噶珊）^②。在混同江的左岸，于亨滚河口（*henggun i giyang*）处的岛上注写满文 *henggun gasan*（亨滚噶珊），在亨滚河口的左岸附近注写满文 *manggacan sgaan*（莽阿禅噶珊）和 *kuben gasar*（库本噶珊）。

根据此图第十九幅所绘的河流、村落名称和地貌特征，以及石礮壁上耸立的两座石碑的图象，毫无疑问，这里所绘画的地理是

①乾隆十排方格《皇舆全图》、十三排《皇舆全图》简译为占屯、瞻噶珊。

②乾隆十三排《皇舆全图》作穆和勒噶珊。

典型的奴儿干地方，石礮上面的石碑就是明代的永宁寺两座刻碑①。（图一）一八〇九年日本人间宫林藏所绘的特林古碑图和



图一：《胡尔哈河（今称牡丹江）入海图》

第十九、二十幅局部。全图总长21.92公尺，高35公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满文译汉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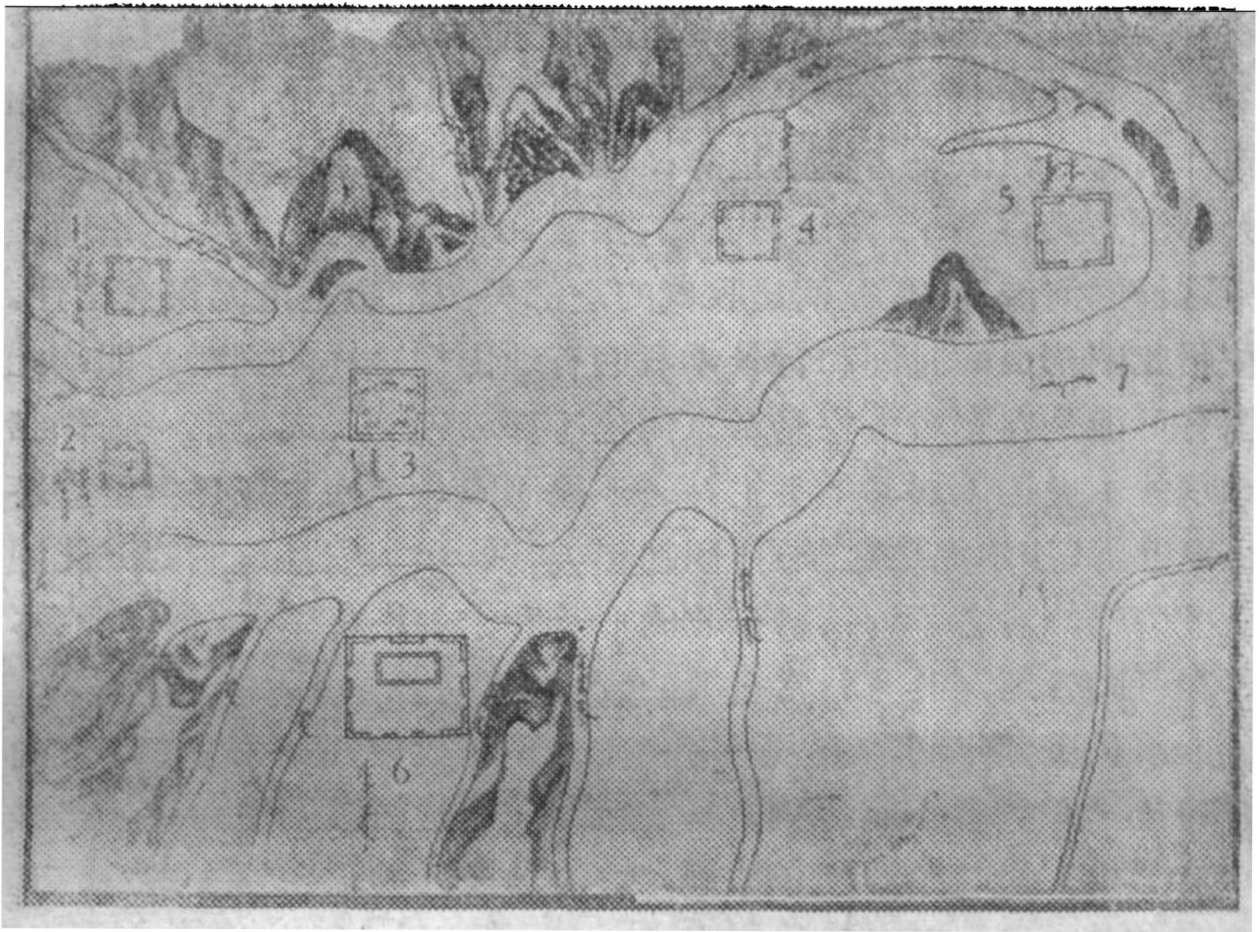
- ①奴儿干永宁寺碑 • ②尖洪科噶珊 ③无名城廓 • ④库浑噶珊 ⑤亨滚河
- ⑥亨滚噶珊 ⑦莽阿禅噶珊 ⑧库本噶珊 ⑨塔克提音噶珊
- 原图无文字名称

①《敕修奴儿干永宁寺记》载：（永乐）十一年秋，卜奴儿干西有站满泾（按即：亨滚河口莽阿禅屯地方），站之左山高而秀丽。先是已建观音堂（按指元代寺庙）于其上，今造寺塑佛（按即永宁寺），形势优雅，粲然可观。

一八八五年清朝官员曹廷杰绘制的《庙尔图》，均与《胡尔哈河入海图》第十九幅所绘之古碑图形相同。（参见图四和图五）

《胡尔哈河入海图》第十九幅，于giyan honko ga^{san}（尖洪科噶珊）和石崖古碑图的后部附近，绘有方形城廓一处，但没有注明文字。这可能是因为此城已成为遗址，无须用文字标明。按《盛京通志》所载的“海边古城”，光绪十一年（1885年）曹廷杰在特林地方所见的“古城基”，一九一九年日本人鸟居龙藏在帝尔（即特林）考察的明代奴儿干都司遗址，有理由断言：这幅图上的无名方形城廓，就是明代奴儿干都司的遗址。（详见后文）。

关于《胡尔哈河入海图》的绘制年代和绘制机关，在图幅上面虽然没有标明，但是依据图形特征，稍加考证，仍然是可以判明的。此图的第一幅，为开头部分，绘有尼堪城（nikan hoton）、布尔哈土城（burhatu hoton）、宁古塔城（ning guta hoton）、佛讷赫城（feneha hoton）、萨尔瑚城（sarho hoton）和开元城（又作刻印城kiyen i hoton）。此六城的地理位置和图形，为我们判断此图的绘制年代提供了可靠的线索。我们知道，宁古塔有新、旧二城，此图所绘的宁古塔城，乃是位于海兰江（又作海浪河）南岸的旧城，并非迁于胡尔哈河（即牡丹江）畔的宁古塔新城。图上绘的城廓图形，只有东西二门，城的北半部绘有大房子一处，小房子东西各一处；城的南半部绘有大房子两处，小房子东西各一处。这三处大房子当是宁古塔梅勒章京（副都统，1653年升格为昂帮章京，即总兵、将军）的衙署。（图二）据《盛京通志》卷三十一记载，宁古塔城原有石城，高一丈余，周围一里，东西各一门。恰与此图所绘的宁古塔城廓形状相符。宁古塔新城建于一六六六年（康熙五年）。据此可知，《胡尔哈河入海图》的绘制年代，至迟应定在宁古塔衙门迁入新城以前。



图二：《胡尔哈河入海图》第一幅局部

满文汉译说明：

- ①尼堪城 ②布尔哈土城 ③宁古塔城 ④萨尔瑚城
 ⑤开元城（又作刻印城） ⑥佛讷赫城 ⑦胡尔哈江
 （即牡丹江） ⑧海兰河

宁古塔是清朝“始祖”所都之地，是北方的军事和行政的重镇，历来受到清统治者的特别重视。因此《胡尔哈河入海图》的绘制时间，往早说有可能是在顺治十年（1653年）前后。因为从这一年起，清朝政府正式把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西起尼布楚东至库页岛的广大地域，划归宁古塔昂邦章京（1662年改称将军）管辖。此时正值俄国侵略者“罗刹”相继窜犯骚扰我国黑龙江流域之际；为了抗击侵略者和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宁古塔地方当局势必掌握胡尔哈河至混同江口一带水域的地理。《胡尔哈河入海图》的绘制，适应了这一军事和行政的需

要。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图形特征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例如，此图共绘城廓图形十五处，并且形象地绘明城的大小，东西南北四门、内外城，以及古城遗址等；沿江的大小支流五十六条，江心大小洲岛六百多个，两岸的石磯、丘陵、山岳等等，均精细地绘明。像这样的河流地图，在清廷收藏的全部舆图里也是绝无仅有之件。按照此图形成的时间和背景，我们有理由作这样的判断，即：此图有可能是在宁古塔梅勒章京海色（1652年），或是第一任昂帮章京沙尔虎达（1653年）主持之下绘制的；至迟也应是在宁古塔将军巴海（沙尔虎达之子）任职初年（1660年）主持绘制的。此图上报清廷，对它了解清初东北的形势和宁古塔将军辖境以内的军事和行政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清代康熙年间，著名学者杨宾，是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内容的最早介绍者。他的父亲杨安城，因罪被流放到宁古塔，母亲亦随同往。他的弟弟生于彼地，颇有才干，被将军召入幕府，凡章奏文书皆出其手。他的父亲“尝采山校猎，多得人参、貂皮，与中土之贾为市，至富累千金。”^①杨宾去宁古塔地方省亲之后，留心当地的历史掌故和口头文献，访问老兵宿将，及其父三十年间之所见闻，最后按“五宜书”写成《柳边纪略》一书。^②因此，他所记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历史遗迹和风土人情，是可靠可信的。杨宾《柳边纪略》卷四记载：

己巳年，人传飞牙喀一碑，本属汉文，而译为满，不能录大要，其地为二岗国。十年教养之后，立此碑版。后书东唐国镇守满种山，将军马元亮，又有都指挥同知官名^③。

这段文字是杨宾依据人们的传闻所记，虽然不甚详明，却指

^①唐甄：《潜书》第216页。

^②杨宾：《柳边纪略·自序》（《辽海丛书》）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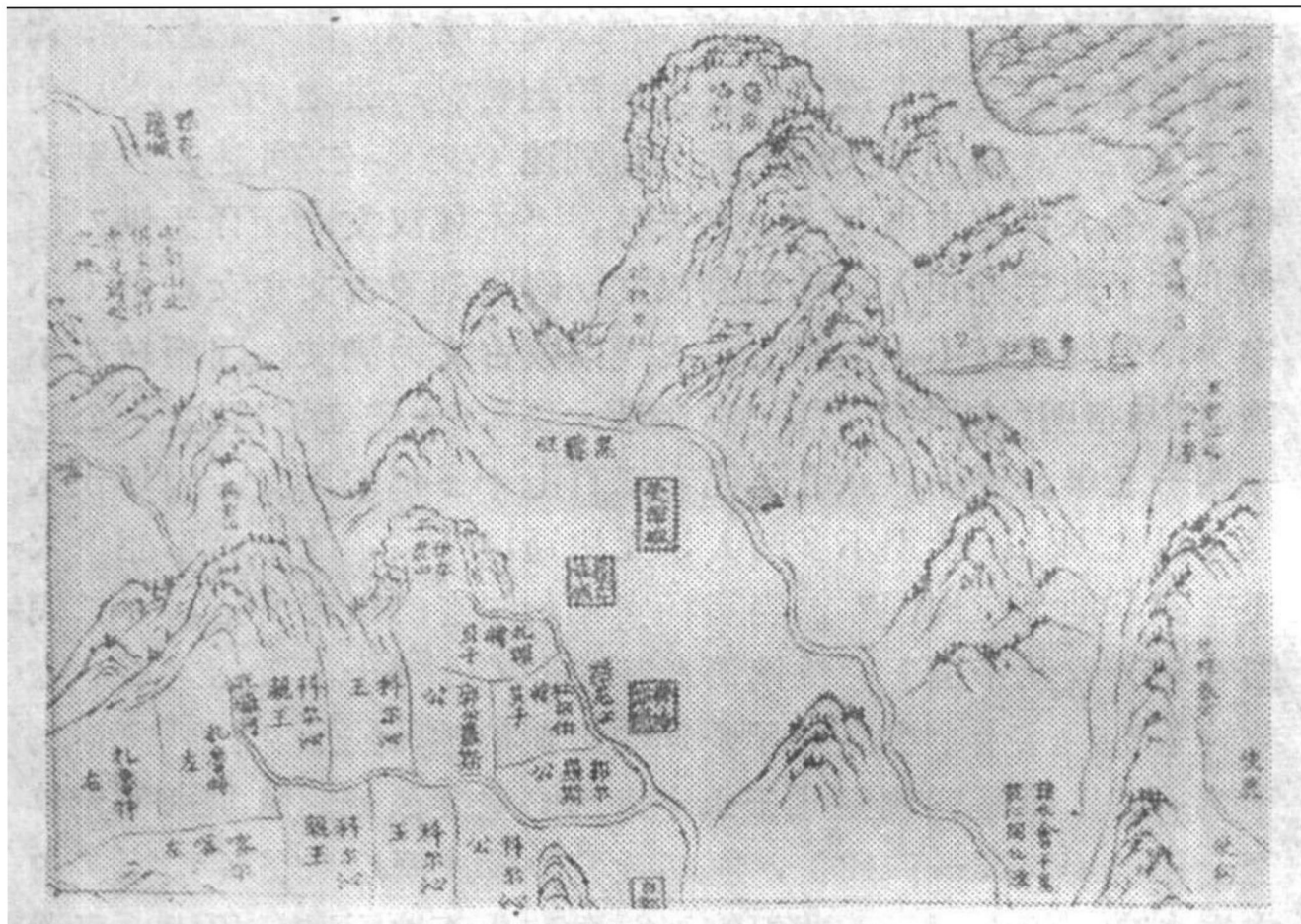
^③同上书，第5—6页。

明了碑在“飞牙喀”居地这一非常重要的事实。这里说的“己巳年”，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飞牙喀”，即费雅喀，清代满洲族称居住在黑龙江下游自奇集泊至特林一带地方的民族为“飞牙喀”。在明代文献上称为吉列迷（又作乞列迷，吉里迷等），今人译作吉里亚克或尼夫赫。“本属汉文，而译为满”，奴儿干《永宁寺记》，碑阳刻汉文，碑阴刻蒙古文和女真文（小字），传闻者当不识女真文，或误以蒙古文为满文，因而转达不确，但却指明“本属汉文”。“不能录大要”，《永宁寺记》碑立于公元一四一三年，至一六八九年已有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因年代久远，风化剥蚀，学识不多的人，无法通读全文，故称“不能录大要”。“其地为二岗国”，当系杨宾据传闻者的语音所记，“二岗国”与“奴儿干国”的快读语音甚相近^①。“十年教养之后，立此碑版”，这十个字概括了全碑的主要精神，是我们明确判断“飞牙喀一碑”就是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的重要依据。从明永乐元年至十一年（1403—1413），明朝政府曾屡次派遣官员（如钦差内官亦失哈、行人司行人邢枢等）前往奴儿干地区进行招抚，广置卫所，开设奴儿干都司衙门，并于永乐十一年九月建造永宁寺，刻碑作记，俱载明朝政府对当地居民的关怀和各族人民效忠明朝的事迹和盛况；从时间上计算也正恰好十年。由上述事实可知，杨宾所记“飞牙喀碑”，确系奴儿干永宁寺碑。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绘制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在黑龙江下游、亨滚河（此图作亨棍江）口处，也明确画有石碑图形（图三）。并且在黑龙江左岸滨海地方标注“飞牙喀”（即费雅喀）三字，右岸滨海地方标注“合真”（即赫哲）二字，表示这两个民族集居和活动的地域范围。此图系山西太原阎咏按照《方

^①参见乌居龙藏《奴儿干都司考》，载《燕京学报》第33期，1947年。钟民岩等《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校释》，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略》、《会典》、《一统志》等文献的记录绘制而成，雕为木



图三：阎咏绘《大清一统天下全图》局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原大 纵117公分，横113公分。

①亨滚河口古碑图形 ②亨棍江，即亨滚河 ③飞牙喀，即费雅喀

板，刷印墨本，纸幅高117公分，宽113公分。阎咏绘制此图，曾得到当时修书各馆的收掌、纂修和编修等官的指导和帮助，因此，此图标绘的古碑图形和飞牙喀、合真聚居地域，也进一步证明清廷的官员是知道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地方有明代的石碑的，尽管此图绘制的不甚精确。

除了私家著述和图籍以外，在清朝纂修的地理志书里边也有简要的记录。例如，清乾隆朝编修的《大清一统志》第四十五卷《吉林山川》项下“殿山”条载：“殿山，在宁古塔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东北二千七百二十一里，上有二碑。”这里所谓的

“殿山”^①，即是指特林地方“满泾站（即莽阿禅屯）之左山高而秀丽”的崖壁，此“二碑”即是指永宁寺的两座明碑。此外，在乾隆元年（1736年）修纂的《盛京通志》第十五卷里记载：“海边古城，（位于宁古塔）城东北三千余里，在混同江东南入海处，城外有元碑。”这里所记的“海边古城”，当是指元明两朝在奴儿干地方的东征元帅府和奴儿干都司治所的城址；所谓“元碑”，当是指元朝在此地建立的刻碑。

根据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在清朝的官方图籍文献里，早已经明确而具体地记录了奴儿干永宁寺的历史遗迹，既知“殿山”上有两座明碑，又知道“海边古城”外有一元碑。总之，已知奴儿干地方共有三座古碑。这一点被以后游窜到此地的俄国人、美国人等所证实。

在清代的图籍文献里之所以能够有如此简明扼要的记载，并非出于偶然，这是和清朝政府对奴儿干地区的经营管理，并熟知当地地理分不开的：

（一）早在公元一六〇八年，努儿哈赤就把宁古塔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一六一六年，就已经派遣官军接管了黑龙江中游地区的萨哈连部和混同江两岸的使犬部（赫哲族），至一六一七年，散居于黑龙江口外的库页岛及其附近小岛上各个部落也相继臣服^②。为了加强对黑龙江中下游以至库页岛地区的行政管理，在宁古塔地方派有官兵“驻防”^③。对这一地区的各族居民，除了建立八旗组织，编入“牛禄”以外，还按部落、家族的居住地点建立基层行政组织——屯设屯长（满语为噶珊达），家族设姓长（满语为喀喇达），并由这些基层人员担负管理户口和缴纳貂皮贡赋等职责，每年前来宁古塔缴纳。

①殿山，似系音译；照此山附近占（瞻）噶珊之屯名而取名。

②《清太祖实录》天命元年八月乙亥朔条，天命二年二月丙申朔条。

③《清太宗实录》崇德元年十二月壬申条。

（二）宁古塔官员和三姓官员，每年都派遣官兵前往齐济噶珊(屯)地方，分别征收东海松花江口赫哲和费雅喀族的貂皮，以及征收库页岛和海套地区的库页、费雅喀等族的貂皮^①。这些征税官兵和缴纳貂皮的世族，当然熟知黑龙江下游以至库页岛地区的山山水水和一草一木。

（三）宁古塔地方官员和清廷官员，在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中，对整个黑龙江流域的地理更是了如指掌，并且早在康熙初年就已经绘制了西伯利亚地图。例如，一六七六年（康熙十五年）七月，俄国使臣斯帕法里来北京，他通过耶稣会士南怀仁窃取了一幅上面绘有“全部西伯利亚地区，标明所有城堡以及附记每个城堡人口”的机密地图^②，就是一个最确凿的例证。

（四）清军将领沙尔虎达、巴海等率领战舰，在黑龙江下游以至海上，曾多次与“罗刹”交战，他们对沿江两岸的地理形势，必然会有详细的了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了驱逐“罗刹”，曾经派遣夸兰大二员，官兵三百人，由恒滚河口飞牙喀（即费雅喀）族噶克当阿等人担任向导，反击罗刹^③。这场战斗就是在恒滚河口进行的。参战的清军将士熟知恒滚河口对岸崖壁上的永宁寺和古碑等历史遗迹，是理所当然的。

（五）从一七〇九年至一七一二年（康熙四十八年至五十一年），清朝政府曾派遣官兵，在西方来华耶稣会士雷孝思（法国人）、杜德美（法国人）、费隐（德国人）、潘如（法国人，非会士）等人的指导之下，先后实地测制了黑龙江口图、黑龙江中图、黑龙江源图。这种大规模的测图活动，岂有不熟悉沿江两岸的历史遗迹之理？

①《乾隆朝杂档》载：吉林等处应行筹办添设税务事宜条款。

②J. F.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1935年版，第378页。

③《巴海浩命》抄本：《清圣祖实录》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丁卯条。

(六) 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曾多次向清廷呈报地理调查报告和经过核实的地名清册，详细地注明每一地点距离省城的实际里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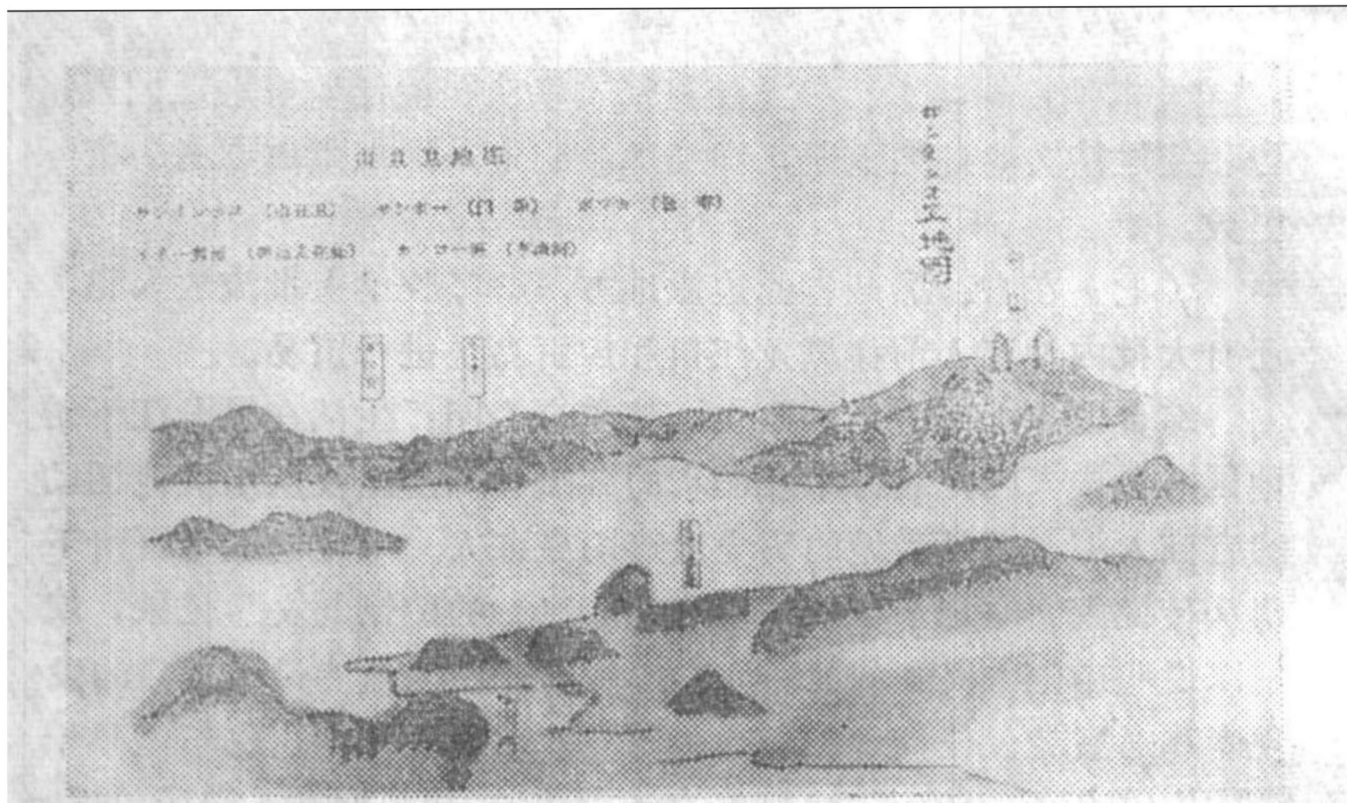
(七) 在吉、黑两省的边徼地方，曾经容纳大批流放人犯，还有大批内地商人前往黑龙江口和库页岛上进行贸易。

综合以上七个方面的事实，都充分表明：生活在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各族人民，履行军政职责的各级官员，以及从事其他活动的官商人等，都是当地的历史遗迹的见证人。不论他们是否留下口头传说或文字记录，仅凭现存的和已知的图籍与文字记录，就足以说明中国人民是奴儿干永宁寺碑的理所当然的最有权威的发现者和考察者，任何外国人的“考察”或“发现”，也不能早于中国人民自己。然而这样简单的历史常识，却长期被人们所忽视，被某些外国学者所歪曲！

二、外国人有关永宁寺碑的考察和记录

日本人间宫林藏（1775年—1844年），于公元一八〇八年（清嘉庆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受日本幕府之命前往库页岛进行所谓的“探险”，至翌年七月十一日进入我国黑龙江下游的德楞地方。七月十七日，由德楞返航，当他经过特林（间宫林藏称为山袒卫）地方时，始发现江岸的高处有黄土色石碑两座，并绘图作记，后来收载于《东鞑纪行》一书。（图四）这位日本人因为是在船上遥望，看不清碑刻文字；然而他却亲眼目睹了当地居民崇敬两座石碑的真实情景，即：“众夷至此处时，将携带之米粟、草籽等撒于河中，对石碑遥拜。”^①然而他根本不知道石碑的所属朝代和当地居民崇敬石碑的真意。日本学者洞富雄在《间宫林藏》一

^①间宫林藏著：《东鞑纪行》，1942年东京出版，卷下第50页。



图四：间官林藏绘《山且卫地图》，《东鞑纪行》一书插图

书中，把林藏的遥望所见，说成是比中国曹廷杰的发现早了八十年，只是未能获读碑记而已。^①这一说法尽管不妥，但间官林藏的记录和绘图却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它证明了明朝政府在黑龙江奴儿干地区（包括库页岛在内）执行“柔化斯民，使之敬顺”的政策所获得的成效，虽然经历了几个世纪，仍在奴儿干地区各族人民中间发生着深远的影响。同时，还进一步证明了永宁寺两座碑记所载明朝政府在奴儿干地区设立都司衙门，兴立卫所、各族首领授以官爵，颁给印信，赠以衣服器用，造寺塑佛，刻碑纪事，以及“国之老幼，远近济济争趋”，“国人无远近，皆来顿首”，誓言“吾子子孙孙，世世臣服”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而可信的^②。直到清代，当地各族依然如此虔诚地崇敬遥拜石

^①洞富雄：《间官林藏》第170页。

^②《敕修奴儿干永宁寺记》和《重建永宁寺记》，参见钟民岩等《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校释》，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碑，正是他们“**世世臣服**”思想的历史延伸和演化。第二，间宫林藏绘画的两座石碑的形状，及沿江两岸的地貌特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旁证，即：清代康熙朝绘制的《胡尔哈河入海图》，其第十九幅上所绘的悬崖和石碑的图形，确为明代奴尔干永宁寺的两座刻碑，其形象和地点，均属正确无误，而且《胡尔哈河入海图》是全流域图，较之间宫林藏仓促之间独绘一处地貌景物的简单绘图要精确得多。因此，洞富雄关于间宫林藏知道永宁寺碑记的存在早于中国曹廷杰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俄国人知道我国奴儿干地方有汉文刻碑这一事实，是在俄国殖民者侵入到我国黑龙江下游地区以后。一六七六年，俄国来华使节尼古拉·斯帕法里，根据哥萨克的传说，留下简单的记录：

“二十年前，在黑龙江上和黑龙江口同中国人打过仗的我们的哥萨克人告诉我们：沿河上溯两天路程，有一个悬崖上平整出来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逾二十普特的中国吊钟，在那里，他们在三个地方发现有铭刻汉文的石碑。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古时候有一个中国皇帝从海路来到了黑龙江，并且在那里留下了这个碑刻和钟作为纪念和标志。”^①这段文字虽较中国学者杨宾的记述大为逊色，根本没有涉及碑文的内容；但是，根据这段文字描绘的路程和地貌特征，可以断定这里正是永宁寺和碑刻的所在地。这就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一个重要事实，即黑龙江流域早在俄国侵略者窜犯之前，就已经置于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那里的永久性纪念物——石碑和钟便是最实在的历史见证。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沙皇俄国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各式各样的殖民主义分子和团体相继窜入黑龙江流域，搜集各种情报，考察沿岸的地理和风土民情，用以为俄国的侵略扩张政策

^①尼·哥·斯帕法里：《到中国去的路线》，转引自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224页。

服务。俄国人知道我国明代的奴儿干永宁寺和石碑等历史遗物，就是他们得到的各种情报的一部分。

一八五四年，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决定派遣“调查队”，调查自黑龙江至海口的地理状况；俄国地理学协会西伯利亚分会学术调查团也同时前往，至一八五五年一月七日到达特林地方调查。在此地他们发现了三块石版铭刻和一个吊钟，并作了现场记录。第一座碑，立于距断崖两步之处，碑座系花岗岩，碑身系绿色之花岗岩质石灰岩。此纪念物镌刻有两种碑文，记述此处曾有寺院存在。但是，俄国人根本无人能全部识读碑文，只认出“永宁寺记”和分辨出汉文、女真文、蒙古文和藏文字体。第二座石碑位于断崖边缘，距第一座石碑十六步，置有斑岩制的八角形碑座。根据当地居民揭露，此碑的上部被最初窜到这里的俄国人所破坏，堕入江中。第三座与第一座相同，亦由花岗岩所造成，立于十六步之处，并镌有文字。距以上石碑约三百五十码之地，有一处较大的八角形砖塔，立于狭而隆起之地；后为俄国人所破坏，毫无痕迹可寻。但据一八五五年俄国人帕米金等绘制的砖塔形状来分析，此塔当属于辽金时代的遗物^①。一九〇四年（清光绪三十年），俄国人将永宁寺的各项遗迹尽行拆毁，两座永宁寺记碑被转移到海参崴博物馆，^②以后又移往伯力博物馆。

一八六九年，俄国人A·米奇、Г·拉杰、P·马克发表了《在阿穆尔和东西伯利亚旅行记》一书，对明代奴儿干地方的永宁寺和碑记也曾有过一段记载：“在特林地方的阿穆尔河岸上矗

^①鸟居龙藏：《奴儿干都司考》，载《燕京学报》第33期第41页。

^②鸟居龙藏《黑龙江和北桦太》第149页载：“据居住在帝尔的俄人说，石碑除运往今海参崴博物馆的两座碑外，尚有一碑。从此处将碑石移往海参崴时，其两座碑完全载入船中，而另一座碑坠落绝壁之下，沈入深渊。学者们宜竭渊而掏出之。”（1934年版）。

立着一个陡崖，高达一百呎，在陡崖的顶部还保存着若干个纪念碑和庙宇的残迹。有一个纪念碑是用花岗岩做底座，上面立着一块长方形的大理石，上面有着各种文字写的题词，中文的题词是‘永宁寺’，意思是永远安静的庙宇，而梵语（从略）根据克拉普洛特的解释，意思是‘阿！最尊贵的罗图斯，阿门！’后一个词，好像喇嘛说的话，作为庄严诵经以及在进行认真的专门的祈祷时的结尾。”^①这三个俄国人对永宁寺碑文的汉、女真等文字及内容仍然是不甚了解，对梵语的解释也很肤浅。

一八五六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律师、驻俄国商务代办佩里·麦克多诺·柯林斯，在俄国官方的支持下，横越西伯利亚，由黑龙江河源顺流而下，直至黑龙江口进行所谓“考察”；一八六〇年发表了《阿穆尔河纪行》一书，其中对奴儿干永宁寺碑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我们到了右岸一个岩石的海岬，离尼古拉耶夫斯克上游一百三十里，这里可以见到一些纪念几百年以前鞑靼人君临这个遥远地区的古碑。一座悬崖陡然耸立在河滩上，悬崖高达一百呎，崖顶上有一块相当大的平地，上面布满橡树、白杨和枞树，以及茂密的花草和灌木。在崖顶最西端屹立着两座石碑，其东约四百码，在一块地势稍高的地方，在一个光秃的岩石基础之上屹立着第三座石碑，悬崖方向朝南。在最先提到的两座石碑的后面，有一所大建筑物，现在只剩下一些断垣残壁，在这些废墟的内外，都有几个发掘过的坑穴。这些断垣残壁比周围土地高出六到八呎。石碑附近可以见到几块近乎方形的石块，石块面上四边都刻着一条深达一吋的槽。这些石块或许是供献牺牲的祭坛，从前无疑是造得很高而且是在寺庙里的。在两座石碑之间，地上竖

^①A·米奇、Г·拉杰、P·马克：《在阿穆尔和东西伯利亚旅行记》，第285页，1869年。

立着两根四十呎高的树杆，这两根树杆除了树梢以外都剥去了树皮，树梢梢头有几根树枝，上面饰以花圈并用树藤或树皮把那些花圈扎在一起。石碑上绕着用精心加工过的木片或树条做的花环，中间用柳树穿扎起来。两座石碑的基址，象祭坛一样，也用刨花做成的花朵加以装饰，这些花朵插满了周围的土地。在这个悬崖远远突出的一角，有一些上面长着青苔的碎石块，这是另一座石碑的残迹，在这里，信徒们也虔诚地围上了木片制的花朵。放在这种标志着昔日‘蒙古’威权的遗迹之上的虔诚的纪念品，显然是这里土著居民的虔诚的献礼，这些土著居民对这个地方及其在古代的用途，怀有一种神圣、持久和强烈的信仰，这种木片制成的花朵无疑是一年一度的献礼，还可能加上一头牲畜作为向这个地方的神祇赎罪的牺牲。”^①根据柯林斯的考察记录来看，他所见到的古碑除了三座完整的以外，还有一处残碑碎块，这是他提供的新情况，比前述俄国人所见为详。因此我们有理由断定，在他见到的崖顶最西端屹立着的两座石碑，不是元代的石碑，而是奴儿干永宁寺记两座明碑，其第三座碑今已无存，不得而知。柯林斯对当地土著居民虔诚崇敬崖顶建筑物遗迹和古碑所作的细致描写，比日本人间宫林藏的见闻更为具体，他承认当地居民对这里的历史遗迹“怀有一种神圣、持久和强烈的信仰。”这一点很有意义，再一次证明明朝政府在当地推行“柔化斯民，使之敬顺”的政策给当地居民留下了极为深远和持久的影响。

柯林斯对永宁寺记碑的正文未作过深入研究，仅仅对“永宁寺”和藏文字母的梵文：“唵嘛呢嘛叭唵吽”作了一点肤浅的解释。他和俄国人一样，也还是停留在对古碑所在的地理环境和碑的形

^①〔美〕查尔斯·佛维尔编：《西伯利亚之行》四十七《古碑》，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此处引文中间有所删略。

式方面的描述上，对碑文的实质内容还没有真正的揭示。

一八六一年，英国人拉文斯坦发表了《俄国人在黑龙江上》一书，对明代奴儿干特林地方的历史遗迹做过简明介绍：“在阿姆贡河（即亨滚河）口附近的黑龙江左岸屹立着一处高达百呎的断崖，在其顶上发现有古刹的碑、塔二、三处和其他遗物。碑石之一立于距绝壁大约二步远的地方，碑高五呎。另一碑的碑座是花岗岩，碑身是纹理鲜明的灰色大理石。此二碑刻有铭文，记载着在此处建造寺庙之缘由。”^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俄国人、美国人和英国人等关于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的考察和介绍，均属表面上的、形式上的，真正解释实质内容的，可以说一点也没有。近年来，苏联学者吹嘘他们的前人如何最早地发现和研究了永宁寺碑文的内容，这纯属荒唐无稽之谈。因为他们的前人既不甚了解汉文、女真文等中国文字，更不理解它的真正内容。直到中国学者曹廷杰公布了奴儿干永宁寺碑的考察结果之后，俄国人瓦·巴·瓦西里耶夫才在一八九六年发表了《关于黑龙江口附近悬崖上的碑文的记载》一文，刊载在《帝俄科学院通报》第四期上面。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一四一一年明朝政府在奴儿干地区“建立了地方管辖机构，把奴儿干改为省一级的都司。”另外一个俄国人，名叫П·波波夫，一九〇六年发表了一篇很不像样的文章，题为《关于特林碑铭》，登载在圣彼得堡《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部札记》第十六卷上面。他肆意歪曲历史，胡说什么“明朝皇帝没有能够把远东地区北方诸部落列入他的封建国家的版图之内。阿穆尔河下游的居民对于明朝的隶属关系始终是形式上的。”他的谬论显然是为老沙皇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的，然而竟被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苏联历史纲要》（14—15世纪）的编者所沿

^①〔英〕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193—197页，1861年伦敦版。

袭^①，直到今天还为苏联学者麦利霍夫等人死死抱住不放^②。

三、曹廷杰的杰出贡献和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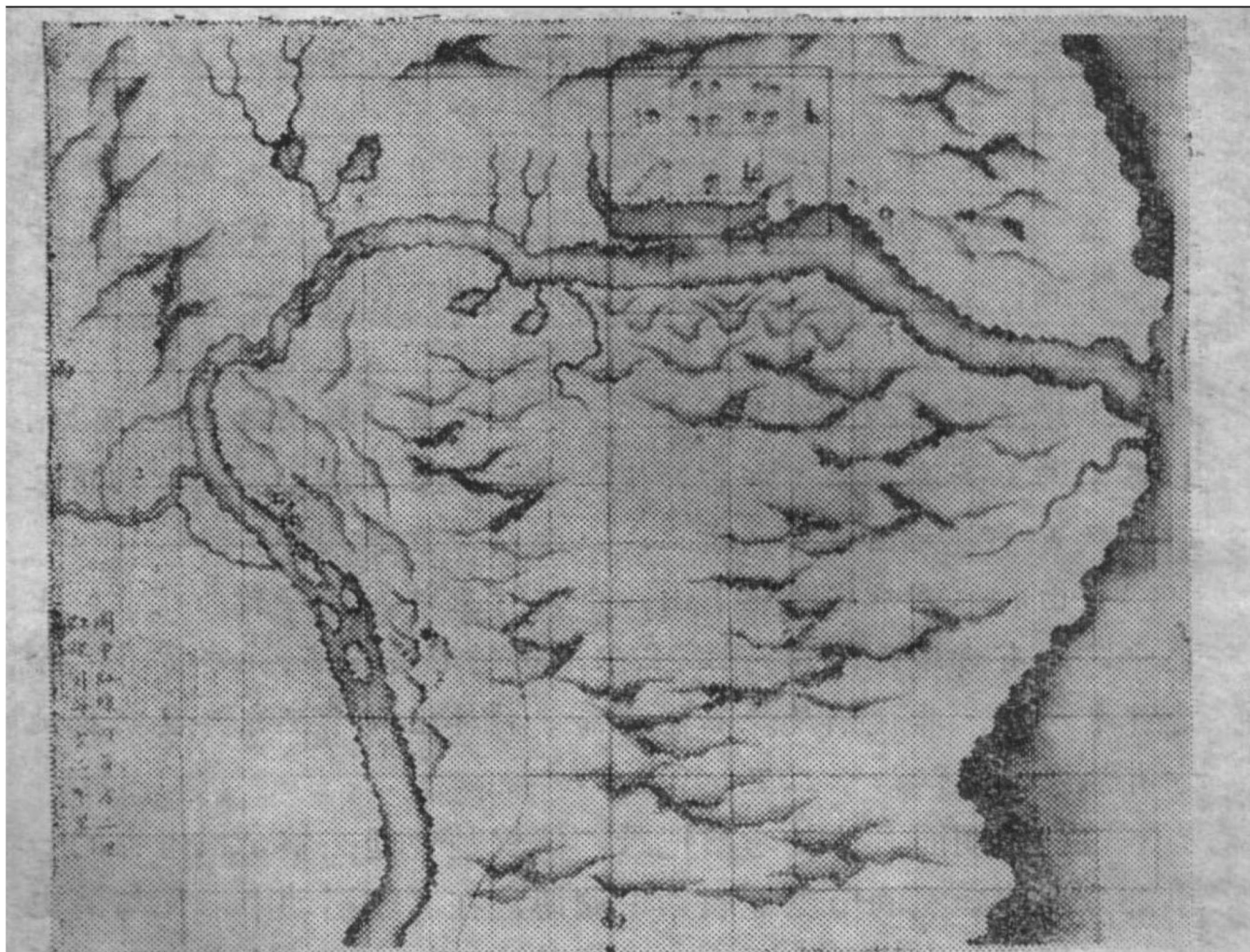
最先通读永宁寺碑记，作过研究并明确判定是明朝碑刻的人，根本不是俄国人，而是中国清朝官员、历史地理学家曹廷杰。他根据碑文的记载，清楚地指出：两篇碑文“皆述太监亦失哈征服奴儿干及海中苦夷（即库页岛）事。”并且还批驳了东北边塞尽于铁岭、开原之说，指出“其说殊不足据。”从而为我国东北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了新鲜史料，拨开了蒙在明代东北边疆史上的浓云迷雾。

曹廷杰，湖北枝江县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廩贡生考充国史馆誊录，从而使他有条件熟悉和研究东北边疆的历史和地理。由于他工作勤奋，成绩优异，被清廷“议叙”为候选州判。光绪九年（1883年）他投效吉林将军幕下，光绪十一年（1885年）三月二十二日受希元将军之命，乔装前往伯利一带探查当时俄国东海滨省地区上的布防、道路及咽喉要害。曹廷杰四月十三日由三姓（今依兰县）启程，四月二十七日进入俄占领地界，顺松花江至东北海口，复由海口溯流入黑河至海兰泡地方；仍顺黑河返伯利，溯乌苏里江过兴凯湖，经红土崖由旱道至海参崴，坐海船入岩楚河海口，于九月初八日入珲春界，十月十二日回省销差。曹廷杰探察历时一百二十九天，往返行程一万六千余里，写成考察报告一百一十八条。凡俄国“所占吉、江二省地界，兵数多寡，地理险要，道路出入，屯站人民总数，土产赋税大概，各国在彼贸易，各种土人数目、风俗，及古人用兵成迹，有关于今日边防，

①《苏联历史纲要〔14—15世纪〕》，第462—474页。

②格·瓦·麦利霍夫：《明帝国对女真人的政策》（1402—1413年）。

与夫今日吉、江二省边防可以酌量变通，或证据往事、堪补史书之阙者，皆汇入其中，……缮具清册一本，并绘图八分。”^①曹廷杰的报告，博得吉林将军希元的高度评价，并专折向清廷奏报他的功绩，称赞他“识卓才优，勤能稳练，究心时务，熟谙舆图。”光绪十二年（1886年）五月由吏部带领引见，清廷授给曹廷杰知县职衔，仍发吉林差遣委用。^②曹廷杰在考察过程中，曾对特林



图五，曹廷杰绘《庙尔图》，图幅纵、横各39公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①特林古碑，即奴儿干永宁寺碑 ②莫胡抡屯 ③恒滚河 ④噶穆河

①曹廷杰原禀和绘图，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内。

②曹廷杰：《密探俄界情形禀文》；吉林将军希元等：《为遵旨派员侦探边情地势摘要密陈折》，载《辽海丛书》本《西伯利东偏纪要》第1页，第45—46页。

地方的历史遗迹作了详细考察，并亲手拓下永宁寺两座碑记的铭文，绘制了两座碑石的所在位置图（图五）。兹将曹廷杰有关明代永宁寺的稟文摘要如下：

查庙尔上二百五十余里，混同江东岸特林地方，有石礮壁立江边，形若城阙，高十余丈。上有明碑二：一刻敕建永宁寺记，一刻宣德六（八）年重建永宁寺记，皆述太监亦失哈征服奴儿干及海中苦夷事。论者咸谓明之边塞尽于铁岭、开原，今以二碑证之，其说殊不足据。谨将二碑各拓呈一分。

查敕建永宁寺碑阴，有二体字碑文，其碑两旁有四体字碑文，惟‘唵嘛呢叭嘛吽’六字汉文可识，其余五体俱不能辨。（中略）今此碑共六体文，非廷杰浅见所能测，谨折呈一分。

查永宁寺基，今被俄人改为喇嘛庙（指俄人东正教堂），二碑尚巍然立于庙西南百步许。（中略）拓碑时有喇嘛（指神甫）铺拉果皮与土著济勒弥（即吉列迷）种六、七人在旁观望，均谓此碑系数百年前大国平罗刹所立，土人以为素著灵异。

查由特林喇嘛庙西北下山，沿江行里许，有石岩高数丈，上甚平旷，有古城基，周约二、三里，街道形迹宛然，瓦砾亦多，今为林木所翳，非披荆履棘不能周知。特林上六十里东岸莫胡抡地方有温泉，距江沿十二里。①

这样简明而具体的考察记录，仅仅是曹廷杰整个报告中的一小部分。曹廷杰的历史地理知识渊博，在考察活动中，凡与清史相关者均能加以联系或评论。这是以往任何一国的“考察”者所无法比拟的。他不畏艰险，身履其境，亲手拓碑并呈报清朝政府当局。这一事实本身就雄辩地证明：真正揭示了奴儿干永宁寺两篇碑文内容的荣誉和功绩应属于清朝官员兼历史地理学家曹廷

①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辽海丛书》本第22—23页；又见《军机处录副奏折》

杰。曹廷杰的考察结果公布以后，进一步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重视，从而出现了新的局面，有众多学者去研究和发掘我国明代东北疆域的历史；有关明代奴儿干都司、卫所及永宁寺两篇碑记的著述也相继出现。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在吉林将军长顺主持下编修《吉林通志》时，吸收了曹廷杰的考察成果。通志的编者在《吉林通志》卷二十六《坛庙》项下，对永宁寺的地理位置作了简要说明，指出：“永宁寺在今伯利下二千零二十里，混同江东岸特林地方，西南距三姓三千五百余里，北距混同江口三百余里。”同时将永乐、宣德两碑全文附录在《吉林通志》卷一百二十《金石门》内。这是清朝地方当局对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进行研究的最早记录。编者引用确凿的史实，印证了我国元明以来经营东北边疆（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历史。他们据《元史地理志》、陶宗仪《辍耕录》等文献的记载，正确地说明了“奴儿干”一名的由来，并且指明奴儿干是元朝的犯人流放地，是东北的著名地区，是费雅喀、奇勒尔等族的居住地。编者们对碑文中族名（如“吉列迷”、“苦夷”）、官名秩品等项作了简要的考证，同时对杨宾、曹廷杰等人的讹误之说作了分析和评论。从而为中外学者研究明代奴儿干都司的历史和永宁寺碑记的文字内容揭开了序幕。继《吉林通志》之后，黑龙江省修志馆又据《吉林通志·金石门》和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读史丛录》所录永宁寺两篇碑记的释文，作了校正，编入《黑龙江志稿》（卷六十二）一书。

自明治以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日本学者对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的研究，在历史地理的考证方面取得某些成就。但是，大都带有日本帝国主义“满蒙政策”的烙印，其宗旨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石泽发身（即大仓发身）在一九〇〇年（明治33年）十一月出版发行《白山黑水》一书，对奴儿

干永宁寺两座碑记作了介绍、转释。同年六月，内藤虎次郎在《历史和地理》杂志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了《明东北边疆辨误·附奴儿干永宁寺碑记》一文；一九二九年（昭和4年）六月，又写了《奴儿干永宁寺二碑补考》一文。后来又将这两篇文章收录在《读史丛录》一书。内藤虎次郎根据《明实录》等文献的记载，对照两碑所记的事实，确认奴儿干地区是明朝政府的管辖疆域，指出：“奴儿干之地，不可说在明疆域之外^①。”他的解读碑文的初步成果，曾受到学术界的承认和欣赏。一九三四年六月，和田清在《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十四号上发表了《明初的满洲经营》（上），一九三七年一月又在该杂志十五号上发表了《明初的满洲经营》（下）两篇长文。后来又将两文收录到《东亚史研究》（满洲篇）里面。和田清根据《明实录》等文献，比较全面地考证了明朝政府经营东北边疆地区的过程，特别对奴儿干都司及其所辖卫所的设置状况，官员的任免和赏赐，以及永宁寺碑记中的人物的身世等，均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因而曾引起学术界的极大注意。但是，也须指出，他对明代历史的解释，不仅明显地带有某种偏见，而且还有较多的臆测成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中国学者罗福颐、日本学者园田一龟两人，分别对永宁寺碑文作了考证和校录，增补和订证了若干文字，录文分载于《满洲金石志》和《满洲金石志稿》中。在《满洲金石志》卷五里，罗福颐对奴儿干永宁寺两碑记的内容及题名等项也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于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九、十月间曾前往帝尔（即特林）考察明代奴儿干都司、永宁寺和碑记的历史遗迹，亲见俄国当局摧残这里的历史遗迹以后的情状。他在

^①内藤虎次郎，《读史丛录》第87页。

《黑龙江和北桦太》（汉译本书名作《东北亚洲搜访记》）一书中作了如实的描述：“帝尔（即特林）为明代之东方经略上不可闲却之地，有名之奴儿干都司即设于此。又有永宁寺，有观音堂，有碑二，叙其建立之由来。此地位置，后负小山，前临大江，中有一河注入江中。……后面之小山，其一角突出于江中；要之，系一丘陵，在其处发达。临江小丘，成为断崖，屹立于上。其丘上有观音堂及石碑，观音堂早圯，石碑则日本明治初尚在此处，其后移动，今则保存于海参崴之博物馆中。沿河低处，尚有奴儿干都司衙署，虽在今日，尚可自土中掘出当年中国人所用之陶器；冈上有堂宇之瓦，及砖塔残部种种。”“有观音堂之处，在临江之崖上，其旁有二碑，碑与庙之间，有一砖塔。此处有塔，于间宫林藏氏之《东鞑纪行》中已可见之。又一八五〇年俄人至此时，塔尚存，今尚留有草图。”“但俄人其后乃拆毁之，其碎砖分配于哈巴罗甫喀、海兰泡、海参崴等处之博物馆。”^①

鸟居龙藏在特林地方特别注意地下遗物，他在观音堂进行试掘，获有盖屋用的圆瓦，“瓦上有刻龙者，亦有刻鬼面者。”

“奴儿干都司之遗迹，在冲积层稍上之处，今为耕地矣。此处亦有陶器破片，如青磁碎片，或米色陶器之碎片，尚留其中。”

“据俄人所传，谓曾掘出砖墓，大抵系明人葬地也。”^②

根据特林历史遗迹和碑记的事实，鸟居龙藏承认中国对奴儿干地区的历史继承关系。他说：“奴儿干都司之奴儿干，初非华语。碑上刻有女真及蒙古文字，且（碑）文多汉人以外之人名。以此观之，此处本为女真地域，蒙古人（指元朝）业以此为势力

①②鸟居龙藏：《黑龙江与北桦太》第146—151页。

又见鸟居龙藏：《东北亚洲搜访记》，汤尔和译，第153—156页。

中心地，汉族不过继踵其后而已”^①。

一九四七年，鸟居龙藏在中国《燕京学报》第三十三期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奴儿干都司考》，后来收录在《鸟居龙藏全集》第六卷里面。作者不仅着重论证了元明时代中国当局对黑龙江流域的行政管辖，而且从当地出土文物、居民的宗教信仰、民族语言、建筑形式、奴儿干都司、永宁寺碑记和观音堂的遗址等方面，进一步论证了元明以来中国政府管辖黑龙江流域的历史继承关系。

一九五九年，日本学者长田夏树发表了《奴儿干永宁寺碑蒙古、女真文释稿》一文。他从语言学、文字学方面对奴儿干永宁寺碑文中的蒙古文、女真文作了全面解读，为畅读蒙文、女真文提供了可喜的成果^②。早在此文之前，曾有中国人罗福成发表过《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女真书图释》一文，载在《满洲学报》第五期上。

关于奴儿干永宁寺两座石碑的拓本、照片，是研究明朝政府经营东北边疆历史的珍贵资料，因而得到各方面学者的重视。

我国历史地理学家曹廷杰是永宁寺两座碑记的最早拓印者和传播者，他在一八八六年（光绪12年6月）将一份完整的碑记拓本进呈给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据《吉林通志》卷一二〇《金石志》附录记载：“此碑拓本，海内惟两分，一为曹氏所藏，碑侧之文已失一纸，一为光绪十二年六月，曹氏呈送总理各国事物衙门之本，其文尚全。”

随着照象技术的广泛应用，永宁寺碑记的形制和文字也得到

①鸟居龙藏：《东北亚洲搜访记》，汤尔和译，第153—156页，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

了比较广泛的传播。一九二三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海参崴博物馆亲见永宁寺两碑的原型实物，并摄影和拓印纸本，其图版刊载在《黑龙江和北桦太》一书之中^①。原海参崴远东大学所藏的明奴儿干永宁寺碑阴拓本，鸟居龙藏亦摄有照片，并被编入《东洋历史参考图谱》一书。一九三七年，日本京都帝大文学部梅原末治受内藤虎次郎的嘱托，于赴欧途次，在海参崴博物馆手拓碑文，后为内藤乾吉收藏。《满洲金石志稿》第二册收录的碑文拓本照片，就是采用内藤乾吉的拓本；《满洲金石志》一书收录的奴儿干永宁寺二碑的释文，也是借用内藤乾吉的拓本^②。内藤虎次郎《读史丛录》一书收录的永宁寺碑文拓本照片中，除奴儿干永宁寺记碑的碑阳文字（汉文）和碑阴文字（女真文、蒙古文）以外，还载有碑侧拓本照片，即汉、蒙古、藏、女真四体文字。《满洲金石志稿》第二册，还收录了奴儿干永宁寺碑在海参崴博物馆原型陈列的照片。上述两件明确记载中国明朝政府管辖疆域和领土主权的历史文物，早已广为传播，为中外学者所熟知；不管苏联的学者们如何歪曲、掩盖两碑的真实内容，都只能是枉费心机，欲盖弥彰罢了。

近几年来，为了揭破苏联学者伪造、篡改我国东北疆域历史的种种谎言，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以正视听，我国的史学界对东北疆域历史的研究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尤其对明代奴儿干永宁寺两篇碑记的研究考证取得了新的成果和收获。一九七四年，钟民岩发表了《历史的见证——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文考释》一文^③。一九七五年，该作者又和那森柏、金启琮合作发表了《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校释——以历史的铁证揭穿苏修的谎言》一

① 鸟居龙藏：《黑龙江和北桦太》图版，1943年版。

② 《满洲金石志稿》第二册《序》；《满洲金石志》六，第18页。

③ 载《历史研究》杂志1974年第一期。

文^①。前一篇文章充分揭示了两篇碑记的实质内容，进一步阐明了黑龙江流域是中国传统的固有疆土，历来受中国政府的经营和管辖；明朝政府在这里行使国家权力，广置卫所，开设奴儿干都司衙门，是对中国传统疆域的合法继承；正确地评价了内官亦失哈等人的历史贡献，有力地阐明了明朝政府经营管理奴儿干地区的措施和政策；驳斥了苏联学者歪曲、伪造我国疆域历史的种种谎言，击中了伪造者们的要害。后一篇文章，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补证了两碑的缺文，纠正了以往的误识之处。经他们校正之后，《永宁寺记》正文补正了五十余字，仅空四十个字；《重建永宁寺记》正文补正了二十余字，尚空十九个字。蒙古文碑记比以往的录文增补了四十余字，订正二十余字；女真文碑记亦有四十余处得到补正。总之，明代奴儿干永宁寺两篇碑记，经过中日学者，特别是钟民岩等人的辛勤努力，目前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校释本^②，这不仅为我们正确理解和研究碑记的全部内容提供了范本，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使汉、蒙古、女真三种文字的碑记具备了明显的证据作用，成为研究中国东北疆历史的原始铁证。

①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②为了说明研究校订永宁寺两篇碑记的进展情况，仅将各文献所载碑文缺字列表如下：

碑名	缺字\文献 《吉林通志》 《白山黑水》 《读史丛录》		
敕修永宁寺记	318	102	105
重建永宁寺记	283	—	133

碑名	缺字\文献 《满洲金石志》 《满洲金石志稿》 《考古学报》		
			(1975年第二期)
敕修永宁寺记	93	62	40
重建永宁寺记	66	51	19